

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

——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

王崇杰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地缘商会因其乡情文化符号、民企聚合体、自治等特点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双向嵌入在所在地与乡籍地社会环境中发展。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企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分析在两地空间结构限定下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限定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短暂发展史中面对问题及时调整与迅速规模化;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专业主义指导下全方位服务路径;基于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打造而构成的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关键词 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双向嵌入;内在动力;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C 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8)06-0140-10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8.06.018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商会组织为会员企业应对这种压力提供了一个聚合能量的平台。目前,我国的商会种类繁多,其中“行业协会是一种主要由会员自发成立的会员制的、在市场中开展活动的、以行业为标识的、非营利的、非政府的、互益性的社会组织”^[1]。行业协会商会最核心的特点是由同行业企业组织形成。而“异地商会是商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某一行政区域的工商企业在异地投资发展过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在投资所在地以原籍贯工商企业自发组成的民间社群组织”^[2]。异地商会的核心特点是涉及两个地域,即会员企业家的籍贯地和商会所在地,商会对于会员企业的行业属性没有明确限制。从最早于 1986 年 3 月成立的省级上海浙江商会起,经历了 2000 年以前的不鼓励政策到 2003 年“建会到省”再到 2013 年放开地市级异地商会注册,至 2016 年底全国工商联系统内的 6 388 个,异地商会因其促使同乡籍企业抱团发展及在招商引资中桥梁纽带作用的巨大优势而日益受到民营企业与各地政府的重视。

广东省湖北商会自 2006 年 6 月成立以来,从建会时 309 名会员发展到现在 12 000 多家企业会员的规模,并逐渐成为标杆性的社会组织。商会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其能够正视发展中的问题,遴选出有实力有热情的企业家做会长,选择懂得企业需求的企业家作为专职秘书长,不断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并有效服务广东和湖北两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广东省湖北商会的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实地调研,探索主要由民营企业组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地缘商会组织,如何嵌入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中探索自身健康发展路径以实现服务企业、服务政府和服务社会三大目标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按照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说法,商会是由企业、自由职业者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公民等自愿组

成的组织。其主要职能是通过沟通联系、协调服务等,促进工商业以及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发展^[3]。西方的商会主要是行业协会商会,被作为一种经济治理机制与市场和政府等其他治理机制形成替代和互补关系^[4]。其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扮演两种角色(职能定位):政策倡导与政策参与^[5]。美国的行业协会商会大多为前者,被称为利益集团。法团主义国家的行业协会商会则深度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承担“私益政府”职能^[4]。经典的法团主义结构是层级性的,地方层级的协会和更高层级的协会之间是严格的组成与管理关系,地方层级的利益诉求能够向更高层级的协会汇聚,进而影响到国家层级的政策决策^[6]。

国内学者常以民间商会这一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既包含民间的行业协会商会,又有异地商会。学者们最关注的是民间商会的运作机制,基于其“民间”特性而界定为“自主治理”^[3]。这种机制内在包含了五个层面:(1)资格:彼此尊重对方权利;(2)动力:在平等参与中确认的共同利益;(3)基本途径:面对面协商机制;(4)结构: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多元网络;(5)绩效:以自治增进行业整体利益。民间商会的运作逻辑是对四种资源的依赖:(1)精英式的人力资源;(2)行政资源;(3)经济资源;(4)社会资源^[7]。在自主治理的基础上,民间商会将产生什么样的价值,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方面。基于国家—社会—市场(企业)的视角,有学者发现温州商会在发展过程中,与政府、企业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与合作,逐渐形成了“市场主导、政府推动、行业自主”的发展雏形,从某些方面体现了温州地方治理的转型^[3]。在深圳特区,民间商会组织已可以通过协商、谈判、游说、监督等理性化、程序化的活动,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普通公民之间充任桥梁与纽带,起到缓冲、减压的作用,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并逐渐成为地方治理中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方力量^[8]。

关于异地商会,有学者认为应称之为“地缘性商会”。指“来自同一地区、在原籍以外地区创业发展的若干企业主要投资人集体发起设立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乡情为纽带,不受行业限制,也较少受企业规模大小限制的同乡企业非营利性社会组织”^[9]。因为“地缘”本身就是一种属性,所以本文中除援引文献外统一称之为“地缘商会”。

聚焦于地缘商会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与研究民间商会的学者一样,他们也将地缘商会放在了国家—社会—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下,有的学者加入了文化的因素。李长文关注新疆异地商会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从政治身份谋求、经济桥梁纽带、自治基础上的社会公益和文化融合四个层面进行了解读^[2]。张冠重点关注地缘商会与所在地政府和社会良好互动经验,认为地缘商会是一种“嵌入性”的自组织,地缘关系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和文化认同构成了商人自组织的基础^[10]。刘玉能认为异地商会的运作处于一种多重约束与对应行动体系相互作用的状态,主要关注了政府与异地商会关系、异地商会权力关系和异地商会实质功能三个问题^[11]。

显然,地缘商会与行业协会商会都具有服务政府、企业与社会的作用,并发挥着桥梁纽带式的中介作用。但地缘商会所内含的“两地、民营企业聚合体”特征,明显不属于法团主义组织类型。聚焦异地商会(地缘商会)的三位学者均关注了商会在所在地的作用,却没有兼顾乡籍地因素。但他们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文化分析视角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

地缘商会因其嵌入两地的独特优势,首先利于衔接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两地政府,其次服务两地社会也有着先天的便利条件。这就决定了地缘商会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有着自身特有的内在动力和约束条件,其发展的路径也反映着我国民营企业与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互动的某种内在规律。而这些在既有的文献当中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尝试以一个典型案例对地缘商会的“嵌入式发展”动力与条件做出总结,并尝试探讨地缘商会组织所代表的民营经济群体发展生态变迁历程与规律。

二、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分析框架

镶嵌观点自波兰尼提出以来,主要是强调经济行动乃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过程;而格兰诺维特则指出这个社会过程应被视为人际互动过程,并在研究组织理论时强调,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组织从事交易必要的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12]。

地缘商会作为社会组织,基于乡土文化底蕴支撑,依赖地缘乡情所链接的熟人信任而聚合了众多

的民营企业,核心职能往往被界定为服务会员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辅助政府治理,同时具有非营利自治属性。由此,地缘商会的发展暗含着嵌入到经济、社会与政治的互动场景之中。

有学者认为,“嵌入式发展”是一种重视社会文化整体的发展模式,力图排除“跨越式发展”中的经济中心向度或“参与式发展”中的政治中心向度。在社会文化系统的内在视野之基础上,将一切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发展方式转而嵌入于社会文化的整体规范系统之中。“嵌入式发展”是一种尊重社会文化实体规范和历史延续性、并倡导共生与交互的政治、经济实践方式。其中,“嵌入”概念内涵五个面向:(1)“嵌入”的空间面向;(2)“嵌入”的总体面向:作为实质性整体的社会文化系统;(3)一个关键的面向:经济作为“嵌入”社会的子系统;(4)被简化的一个面向:政治作为“嵌入”的另一个子系统;(5)一个“过程论”的面向:历史作为“嵌入”的分析视野^[13]。

但是,在政府文件中地缘商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地商会”,是因为商会所嵌涵的空间是双向的。既有乡籍地的深刻底蕴支撑,又有所在地的现实环境约束。因此,其所涉及的空间面向决定了其特定的区域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所以可以将空间面向融合进文化、经济、政治系统当中,加上历史过程,而将“嵌入”的面向缩减为四个。显然,特定的历史、两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两地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两地的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对于地缘商会的双向“嵌入式”发展具有明显的约束功能。基于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支撑,地缘商会如何应对这些约束,形成自己的发展规律,是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三、抱团发展,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广东省湖北商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1. 政府(政策)与市场夹缝中生长的地缘商会

需求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或政府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公共物品需求,这为民间组织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14]。鉴于地缘商会绝大多数会员都是民营企业代表,且其自治性社团特质已经在各地的《异地商会登记管理办法》中被官方限定,所以其民间组织的属性毋庸置疑。那么,市场和政府应该为民营企业群体生产什么公共物品,而现实中却有所缺失,从而促成了地缘商会的兴起,是探讨商会发展内生动力的根本所在。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粗放与模仿向节约和创新转变的过程中,民营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而国家资金支持有限与市场空间越来越小构成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现实环境。地缘商会因为聚集了众多的中小微民营企业代表,对这种环境的感受异常清晰。

首先,民企发展的瓶颈——资金问题。调研中所有地缘商会的秘书长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小微企业发展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

调研的时候那些企业家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哎,只要再给我一百万,我的企业今年就能过去,过去了我明年就好了。”但是,就这100万,可能影响了他的一生。(会议记录,2015-11-19,14:30-16:00)

针对这一最为棘手的问题,地缘商会一般选择三条路径来争取解决。第一,银行授信。地缘商会通过集聚企业家会员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组织,可以获得银行授信,以更好地服务会员的发展。第二,内部借贷。尽管有授信,但他们很难真正从银行获得需要的贷款,高利贷风险又过大。很自然,创建平台,利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依赖“熟人”借贷的方式解决问题,成为民营企业组织商会的重要共识之一。广东省湖北商会八年来共协助会员从各大银行获得贷款授信额度740亿元人民币、获得贷款共计12.45亿元人民币,其中无抵押贷款达到2000万元。商会的几个分会组建了互助基金,共筹集资金2300多万元向会员提供资金援助。商会还协助会员企业间相互融资约50多亿元人民币,通过会员内部募集为会员解决资金缺口达10亿元人民币^①。第三,投资公司。通过会员企业集资筹建,然后分红。但这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市场、管理、政策三重风险。调研中有商会秘书长谈到了

① 文中广东省湖北商会的数据均来自内部资料。

他们尝试成立投资公司但最终失败的例子。大家筹钱组建投资公司,雇用了职业经理人管理。但由于职业经理人投资股票亏损,卷款跑路了。最后会长出面果断停掉了这个公司,并做了相关的赔偿。有的地缘商会因为会员融资非常困难,就尝试利用群体的力量成立小贷公司,给会员提供方便。但是,因为一些小贷公司出现了问题,相关地方在政策层面出现了动摇,不再给小贷公司提供机会和空间。这就给地缘商会的以商养会机制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有学者提出通过成立商会发展基金,然后用基金成立一个投资公司,其中关键点在于设计好退出机制,或许可能实现以商养会的目标^[15]。

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还是市场机制发展不完善所造成的。很多银行在选择贷款对象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是资金安全性和贷款企业的信誉、性质、实力等。对于那些风险较大、缺乏有效抵押资本的小微企业,往往有意无意地选择忽视。即使一些商业银行有非公企业的股份在里面,也更愿意服务那些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风险管控更加理性和严格。

商会现在存在着很多小微企业。小微企业资金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他们根本得不到一个银行和单位的支持。……也对接了很多银行,都达不到共识。……我可以这样说,现在商会的小微企业发展的话,基本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甚至百分之八十,基本都属于非常艰难的,真的非常艰难地在维持这样个体体系,这一块是比较那个严重的。(会议记录,2015-10-23,9:15-11:45)

其次,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有名无实。随着国家大力推行政府职能转移,鼓励社会组织承接,只要民政部门评估获得3A—5A级的商会,将具备承接相关职能的资格。这样,这种评估就有了实际的可预期收益,对商会来说有了接受评估的动力。于是很多商会开始按照民政部门的评估指标对自己进行完善改进,积极争取获得5A级的商会牌照。调研和相关资料显示,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较为突出,比如广东在政府职能转移方面走得比较靠前而且按照规范化的方式来运作,出台了大量的文件,保障了社会组织的相关权利。广东省湖北商会也获得了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资质,但真正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案例基本没有。

2. 从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新时代背景下的商会抱团互助之路

地缘商会会员主体中的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发展中往往遵循基本的经济理性原则。但在遇到外部形势剧烈变迁时,则会主动选择抱团发展,成立商会组织互帮互助、维护权益,这又是一种社会理性的体现。当前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大量的权力从而可以调动很多资源,而企业发展恰恰需要这些资源^[16]。所以,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经过打拼取得一定的成绩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有效衔接政府保障自身的权益。以组织的形态寻求资源共享、抱团发展,并通过架起桥梁、链接政府与市场,从而弥补市场与国家对民营企业家群体生存发展所造成的裂缝,构成了地缘商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广东省湖北商会的章程中明确体现了其建会的宗旨,在2012年修订版中曾明确指出“坚持‘两个服务’(为会员服务、为社会服务)”。2016年修订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凝聚在粤楚商精英、整合在粤楚商资源、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提升湖北商人形象、构筑政商沟通平台、谋求会员共同发展、促进鄂粤经济繁荣。”

由此可见,满足经济形势变迁而造成的发展压力增大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政需求二者共同作用下的自发组织抱团发展核心目标,是广东省湖北商会成立的内在动力。

四、广东省湖北商会“嵌入式发展”的路径变迁

1. 简短历史中从结构简单的小型商会迅速走向“总会+分支”的规模化成长路径

现实中,真正满足地缘乡情、工商从业人士、自发形成、无行业及规模限制、自主治理、涉及两地域这些特质的地缘商会在国内仅仅发端于改革开放后,其中最为关键的激发因素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地缘商会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促进两地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社会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受到各

地政府的重视,于是对其成立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推动^[9]。

2000年以前,国家不鼓励成立地缘商会和同乡会。2000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座谈会”上就省级地缘商会的建立和管理问题达成了“建会到省、试点先行”和“双重管理,属地为主”的共识。2003年,民政部颁布了《关于异地商会登记有关问题的意见》(民办函[2003]16号),进一步促进了省级地缘商会的建立^[9]。之后几年,全国兴起了一股成立地缘商会的热潮。

广东省湖北商会即在这股热潮中于2006年6月18日成立,目前已换届两次。其中第二届会长因涉案,商会于2012年9月提前举行了换届大会。商会从刚成立时首批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共309名会员,发展到目前已拥有40个分支机构、16个地域分会、17个乡籍分会、6个行业协会、1个青年商会,会员企业12000多家,年产值6000多亿元,年均提供就业岗位500万个(2016年数据)。

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广东省湖北商会从几百人到12000多家会员企业,期间及时果断解决领导问题,迅速走上了规模化发展路径。这依赖于其嵌入在广东和湖北两地之间寻求不断突破的过程,及其桥梁纽带作用为商会发展所奠定的巨大弹性支撑。

2. 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

地域这一自然条件的综合体对于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黑格尔也说过,“……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与性格有密切关系。”^[17]由于地缘商会的会员以出自乡土社会的民营企业家居多,他们身上往往内含着浓浓的乡土文化与伦理精神。而当这些民营企业家们从家乡来到外地创业发展,又会与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冲突与融合。这种双重文化的影响构成了地缘商会所嵌入的社会文化系统,乡籍文化精神与所在地的文化氛围共同滋养并影响着地缘商会的文化建设。

(1)乡籍文化对商会发展的支撑。现实中,中国人往往被出生地所被标签化。“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江黎明直言自己最初很排斥这种说法。‘贬义居多,主要说湖北人所谓精明,窝里斗,不团结,形象不好。’”^[18]不过,当前这种标签化正在被商人们利用和重塑。湖北籍商人因“鄂”字音形都不满意而自定为“楚商”,并着力塑造新时代的楚商精神文化:“筚路蓝缕、敢为人先;崇文尚智,守信重义;胸怀天下,开放包容;与世相宜,与时俱进。”^[19]广东省湖北商会在会长江黎明的领导下基于楚商文化着力塑造新湖北人精神,从而形成一种文化内蕴,服务于商会的发展。

(会长始终)在不同场合常常倡导“勤劳、团结、包容、创新”的新湖北人精神,致力于将广东省湖北商会打造为“政府信任、社会称赞、会员支持型商会,学习型商会,讲政治的商会。”(访谈记录:2014-11-17,10:30—11:30)

为了适应经济形势的剧烈变迁和外部政策环境的改变,地缘商会日益认识到除了重视乡籍文化,还应该积极建构规范化制度化的组织文化。

(2)所在地的社会环境对组织文化制度化建设的促成。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东为民营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受其影响,制度化、规范化成为地缘商会融入当地发展的自然选择和重要任务。除了章程,地缘商会日常运作制度常见的有20余种。广东省湖北商会的制度有:

会员(代表)大会制度;常务理事会议制度;人事制度(聘用、奖惩、薪酬);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会费管理办法;财务收支审批制度;公章(印章)管理制度;会员管理制度;档案管理规定;证书使用管理规定;办事机构管理制度、工作职责;员工宿舍管理办法等。(访谈资料整理,2014-11-17,10:30-11:30)

广东省湖北商会在会长的领导下,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特色^[18]: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会员实力有大小,制度面前无高低。”商会出现分歧矛盾时,制度是最好的“裁判”。理事会、监事会、党委会“集体决策,相互制衡,确保制度公开、公平、公正运行。”官方评价为“它的制度建设、组织架构、服务机制已经成为商协会建设标准。”显然,制度化建设使得广东省湖北商会的治理体系更加健全,也使商会

成为广东省社会组织建设的一个标杆,为自己的品牌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文化与制度双重支撑下公益慈善品牌化对商会的形象塑造与提升。作为社会组织,地缘商会往往以突出平台优势、长期实施各种公益项目等路径来实现服务社会的核心目标。广东省湖北商会及其会员在鄂粤两地设立多项爱心基金、助学基金,基金总额达300多万元。商会还先后为湖北各地及其他贫困地区捐资助学款达880多万元,捐赠校舍和教学用品价值达800多万元,捐赠电脑、投影设备价值1600万元,捐赠交通工具价值80万元,捐建图书室100多座,资助贫困学生1600多名。

除了大多数地缘商会常用的这种平台公益模式,广东省湖北商会还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创造性地利用特色活动来塑造商会的外在形象并打造属于自己的公益项目品牌——“暖冬行动”:截至2017年1月4日12时,报名人数达18446人。工作人员经历70多天“五加二”“白加黑”的超负荷运转,最后将1500张火车票分配给在粤湖北籍有需要的人群,每位都获赠一份爱心大礼包。湖北省相关部门领导和有关地、市、县、州负责人登上列车慰问返乡乡亲。CCTV13《新闻直播间》、新华社广东分社、新华通讯社、中国铁路报、中国新闻网、腾讯网等纷纷报道。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共派出了30多人的记者团进行了全程采编,报纸版面达到20多个,广播电视直播播音达40多个小时,电视台播出专题节目50多次。尤其是湖北老乡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传播,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令人惊叹。

学者们认为,文化不仅是具有稳定和制约作用的系统,也能够导致变迁。在变革时期,文化更像是行动者的“工具箱”,为行动者提供各种工具^[20]。由此来看,乡籍文化的精神内蕴与组织文化中的制度与平台为广东省湖北商会嵌入到两地的社会网络之中并取得现在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约束和支撑。

3.从简单聚会交流到资金、人才、信息积聚平台支撑下的专业化服务路径

地缘商会在成立之初往往只是搞一些简单的聚会庆祝特定节日以加强交流的活动,真正能够起到为会员、政府和社会提供专业服务作用的比较少,也比较困难。但是,随着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期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民营企业企业家们抱团发展,寻求更专业更有效应对市场困境方式的需求日益强烈。于是地缘商会自然而然地基于自身“异地”特色和企业家聚合的人才与资本优势,通过在所在地站稳脚跟,然后积极链接乡籍地“招商引资”需求,深深嵌入在“两地”的经济系统之中,寻求突破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1)多元路径筹集经费保障商会开展各种服务活动。根据调研和资料显示,当前地缘商会日常运作经费来源主要有六种,包括会费、捐赠收入、资助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服务收入、政府补助收入。一般会费是占比最大的收入。广东省湖北商会设定的会费标准为:会长年会费为50万元,常务副会长30万元,副会长3万元,常务理事5000元,理事3000元,重要会员会费2000元,普通会员不收费。即使这样,因为会员众多,其会费收入达到了1200万元/年。商会还曾因为党建工作非常出色而获得了20万元的拨款奖励。

基于资料和调研反馈,多数地缘商会的会费用于维持日常运作都比较困难。所以,当开展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往往需要寻找有效的渠道筹集资金。其一,兜底机制,即有的商会会长凭借自身雄厚经济实力支付大型活动的费用而不从会费中列支,体现其责任和影响力。有的商会举行重要活动时如经费紧张,一些会长、副会长等积极捐款。其二,市场化操作,即通过市场获得广告与赞助收入。如广东省湖北商会在承办2014中国楚商合作发展论坛时发布了招商指南:

“湖北粮油精品及名优特产展交会”,100家,3~5万元。“湖北省各市县招商项目推介会”,30万元,10个市县。“2014年中国楚商名企录”珍藏特辑,跨页入册10家,赞助费用3万元;单页50家,1.8万元;半页200家,1万元。“全程合作伙伴”,限1家,合作费用基准为300万元。主论坛独家冠名,100万元。开幕式晚会独家冠名,100万元。论坛指定接待酒店,4家,10万元(可客房抵换)。论坛指定接待用车,1家,10万元(可车辆租赁抵换)。论坛指定宴会用酒,红白酒各1家,50万元(可部分实物抵换)。

其三,以商养会是很多商会思考的一个既现实又关键的问题,根本原因是会费维持地缘商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广东省湖北商会结合“互联网+”新业态的兴起,组织力量开发和上架“楚商商城”,线上线下同步联动,上线产品达几万种,客户信息达几十万条。通过楚商商城,实施会员企业集团采购模式。为会员免费推销产品、拓展销售渠道;为家乡推销特产、寻求合作提供服务。同时商会也可以从相关交易中获取部分回馈。

(2)专业主义理念中的人才支撑与多元服务平台建构。西方关于管理第三部门的理念“群落”中,存在着两大对立的观念:专业主义与志愿主义。其中专业主义强调的是市场导向,雇佣专业的管理人才、专职人员来运作组织^[21]。广东省湖北商会有荣誉会长 15 人,其中行政部门领导 10 人,社会知名人士 3 人,有影响力的楚商 2 人。同时有顾问 20 多人,分别来自党、政、军、事业单位等部门,全部是在职人员。商会目前有 12 位全职工作人员,其中有 9 人是 20~30 岁之间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下 2 人,本科生 9 人,硕士生 1 人。有一个科学的组织架构,有一个“把商会当作事业来做”的执行团队^[18]。商会全职秘书长林勇是企业家出身,拥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更加重视市场规律,同时也积累了深刻的社会组织管理思想。

秘书长认为,地缘商会发展存在四个阶段:服务者——建章立制、强化内部治理、保姆式服务;整合者——资源整合,打造社会商会;创造者——创造社会和商业价值,造成经济和社会影响;引领者——确定方向,制度化、规范化,做标杆,造品牌。(访谈记录:2014-11-17, 11:50—12:30)

基于这些专业人才和秘书长先进理念的支撑,广东省湖北商会得以打造了良好的平台保障组织的有序及可持续发展。

首先,专业化服务平台。因为不像行业协会那样被限定在特定的行业中,地缘商会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众多的专业人才,以及商会外部的各种智囊团成员,所以为会员提供专业服务具有先天的优势。广东省湖北商会自成立以来,定期组织举办各类研讨、讲座、培训、论坛,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教授主讲。几年来,共举办讲座、论坛 60 余场(次),培训会员超过 5 000 人(次)。商会还通过成立武汉大学楚商学院强调学习重要性和迫切性。商会组建了 30 多名律师参与的法律顾问团,解决会员经营中诸如税务、工商、消防、安监、劳动等方面的问题 200 多起,解答法律咨询 20 多宗,为在粤老乡解决讨薪、索取赔偿,追讨工程款等纠纷 100 余起。

其次,信息平台。对于地缘商会来说,信息源主要包括内部会员信息和外部信息资源,并可以通过会议沟通和会员之间的彼此交流等渠道来公开。最为有效的方式是对基于数据库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现代信息技术平台的利用。通过广东省湖北商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到其开展的各类活动,充分展现了一个活力强大的地缘商会多元化信息资源集聚所产生的影响力(见表 1)。

表 1 广东省湖北商会微信平台信息发布内容与数量统计

类别	条数	细类与内容(条数)
荣誉信息	4	2016 年度品牌社会组织;“优秀商会示范点”; “全省性社会组织先进党组织”;“5A”商会
节日祝福	5	春节;五一;中秋;国庆;感恩节
内部治理	39	工作人员活动(1);会议(38) 乡籍地政府部门(14);招商引资(12);媒体合作(2); 所在地政府部门调研学习(4);其他地区政府部门(四川、贵州)(2);
接待来访	22	国家媒体(新华社)(1); 马中总商会沙巴分会商务考察团(1)
商协会组织交流	14	国外组织来访(1);所在地组织来访(11);其他地区组织来访(2)
服务会员	25	商务信息(23);社交活动(2)
沟通政府	10	政府信息传递(4);汇报交流(6)
服务社会	17	暖冬行动(14);其他公益活动(3)

注:基于广东省湖北商会微信平台信息整理,统计时间为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

由此来看,广东省湖北商会通过自身的资金、人才、信息聚合平台优势,积极提供专业服务,为会员企业在当地及乡籍地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多元支撑。显然,这种经济发展环境与需求构成了商会深深嵌入到两地经济之中发展的约束条件,也凸显了地缘商会经济嵌入的独特路径和价值。

4. 打造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在中国的宏观语境中,民营企业企业家们必须想尽办法去争取政府掌控的各种资源。地缘商会以服务政府为目标之一嵌入到政治系统当中,并以组织平台的优势为会员参与招商引资及争取政治身份提供支撑以获得这些资源。广东省湖北商会积极通过多种路径达成服务政府的目标。

(1) 党建活动的开展与政治身份价值的发挥。首先,党建活动凸显商会政治敏感性。广东省湖北商会党委是广东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委成立以来批准的全省第一家商会党委。2013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非常庄重、非常庄严、非常振奋。会议流程的规范、选举的严肃严谨、党员代表的认真负责堪比党政机关,在社会组织中是极为少见的。党委成立后,立即开展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对企业发展的信心,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中华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中。

其次,利用组织内部会员的各种政治身份,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建言献策,维护会员利益,促进所在地与乡籍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商会会员中有省级人大代表2人、省政协委员3人、市级人大代表7人、市级政协委员11人、县(区)级人大代表9人、县(区)级政协委员17人。几年来,向鄂粤两省的党、政部门提出建议14份,其中被采纳或引起重视3份;向当地党政机关报送调研材料、情况反映、专题信息12份,向鄂粤两地政策法规文件起草报送意见3件,对涉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提出意见建议2次。近年来,商会在维稳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获得当地政府和维稳部门的充分肯定。

由此来看,党建和政治身份获取成为民营企业企业家们准确把握宏观形势、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两条根本且有效的路径。从而使地缘商会在这两个方面的组织作用和价值得以凸显出来。

(2) 有效社会治理与组织规范化发展的两地示范效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依赖于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付出,广东省湖北商会已经被塑造成一个著名品牌。商会先后组织会员捐建图书室160多座,为捐资助学、抗洪救灾、修路修桥、医疗救助等公益慈善事业捐款累计近1.2亿元,其中2016年为湖北抗洪救灾的捐款就超千万元。各地、市、县、州(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在粤商会、爱心人士,开展爱心接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活动。

由此使得广东省湖北商会至今已拥有数项荣誉和资质,先后获得了5A商会、优秀商会示范点、全省性社会组织先进党组织、2016年度品牌社会组织、2017年中国最具影响力商会、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争议预防调解示范单位、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社会服务资质单位等。获评“促进经济协作创业兴鄂先进商会”,连续多年获“招商引资突出贡献奖”单位及“情系老区人民、支持老区发展”荣誉称号。

显然,广东省湖北商会利用开展的一系列公益品牌行动积极回报乡梓,契合社会需求,链接政府服务,探索出有效的社会治理参与机制。这既给两地政府治理社会减轻了负担,又塑造了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形象,展现了商会嵌入到两地政治社会发展之中的有效机制和自身价值。

(3) 对乡籍地政府招商引资需求的满足。地缘商会是社会组织,但其会员是经济主体,理性逐利是其根本行为准则之一。因此,寻找理想的投资项目成为商人们所关注的核心事件,但是很多关键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地方政府作为政治和行政组织,充分利用手中的资源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根本职责所在。所以,招商引资成为各地方政府促进当地发展的便捷路径及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

由此,地缘商会和其乡籍地政府之间因为共同的乡籍文化符号就更自然和方便地衔接在了一起。这一方面体现在接待乡籍地政府相关部门人员来访,另一方面体现在积极回乡投资。截至2016年底,广东省湖北商会已组织150多次项目考察活动,90%以上的会员企业在湖北都有投资。促成300多个项目落地,2000亿资本回流。还双向传递鄂粤两省经贸合作信息40多万条。同时,这种行动往

往被地缘商会附加上了回报家乡的社会责任内涵,体现了一种不忘初心或叶落归根,回馈乡梓、反哺乡恩的文化意蕴。而地方政府则赋予了其“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亲商、利商、留商、暖商、敬商、懂商、悦商”^[22]的理念意义和服务氛围。

根据其微信平台相关信息统计,广东省湖北商会在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的一年间,接待来自家乡地的各政府部门来访达到了14次,其中有12次访问都直接包含着招商引资的重要主题。由此,广东省湖北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多中心”网络模式。通过频繁的信息交流,保持着交流途径的开放,从而促进和加强了彼此间的信任。信任的增强又更好地保障了商会双向嵌入式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性。

五、结论与讨论

1. 结 论

通过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营企业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在广东和湖北两地政治、经济与社会之中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这种两地空间结构限定的文化、经济与政治条件与商会发展的短暂历史约束了其“嵌入式发展”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广东省湖北商会不断优化自己的发展路径,具体表现在调整结构迅速规模化;基于新湖北人精神、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内部治理机制为其稳定发展与变迁提供了文化支撑;专业主义管理理念指导下的资金、人才、信息多元化专业化全方位经济服务模式为其打造了有效的两地经济链接机制;回馈乡梓、积极维稳、搞好接待、全力投资、政策建议、党建标杆等符号及活动构成了多中心网络政商链接模式,创造了政社组织间参与及合作治理机制。

广东省湖北商会双向嵌入式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以及同政府合作治理的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地缘商会组织发展模式,这些经验也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组织镶嵌及组织间合作治理的理论内涵。

2. 讨 论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一种新常态,中国经济模式正在从粗放模仿型向精细创新型转变。民营企业经历着由最初资源支撑型资本积累及广阔市场空间优势向资源成本日益提升与市场空间越来越狭小的生态变迁过程。同时,随着相关政策的趋紧,市场与政策的夹缝使得民营企业群体面临巨大的转型阵痛,加入商会抱团发展成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选择。广东省湖北商会成功运作的经验,可以提供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认真反思自己所处商会的发展历史,积极寻求改变和规模化发展,从而形成更为坚固和强大的支撑力量。相对来说,目前大多数地缘商会的历史比较短暂。原因在于,一方面在2000年之前国家并不鼓励地缘商会的建立。另一方面,当时的政策与市场环境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更为宽松,各种资源的支撑也比较到位,所以发展困难相对较少。而当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风险迅速扩大,企业发展模式需要做出巨大调整的时候,民营企业单独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弱的点日益暴露。依靠地缘商会抱团互助,需要大家形成更大的合力。基于广东省湖北商会的经验,认准方向,及时解决关键问题,尽量规模化可以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发展。

第二,认清地缘商会存在的根基在于文化的支撑。地缘商会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情的牵拉,而乡籍文化中的乡土伦理与精神内涵是这种牵拉的根本力量。同时,纯粹的情感支撑不足以让一个商会持久发展。需要结合商会所在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氛围积极打造一个规范化、制度化的组织平台,增强商会运作的合法性。

第三,牢记地缘商会的使命是服务。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是会员企业、社会和政府。会员企业需要的关键服务是经济需求的满足。提供专业化的平台,积聚相应的资源保障会员企业良好发展是地缘商会服务的第一要务。作为企业家的聚合体,社会责任必须有所体现,这就要求地缘商会积极服务社会公益事业。一方面积极服务当地社区,另一方面又要真诚回馈乡梓。基于广东省湖北商会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打造自己的服务品牌,提升商会形象和美誉度,能够更好地为商会和会员带来丰富的

资源。

第四,做好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地缘商会服务政府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自己及会员企业的发展,因为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同时也有着极为庞大的需求。很明显,地缘商会可以在招商引资与社会治理两个层面凸显服务政府的价值。一方面地缘商会往往能够撬动或聚合巨大的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资源,另一方面地缘商会的会员企业中最不缺的是专业人才,利用这些资源积极参与当地社会治理与回乡投资,是两地政府乐见其成的有效运作路径。

当然,个案显然不能代表全部地缘商会的发展状态。在笔者的调研中,地缘商会基本上1/3风生水起,1/3平平淡淡,1/3名存实亡。当地缘商会嵌入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当中发展时,其不同的发展状态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存在,或者其各自的发展动力及约束条件有什么样的差异和共性,还有待于其他案例和总体性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贾西津,沈恒超,胡文安.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2] 李长文.民间组织与地方治理——基于新疆异地商会的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 [3] 郁建兴.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 [4] STREEK W, SCHMITTER P C. Community, market, state and associations? The prospective contribution of interest governance to social order[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5, 1(2): 119-138.
- [5] COLEMAN W D. Business and politic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M].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 [6] 纪莺莺.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影响力:制度环境与层级分化[J].南京社会科学,2015(9):65-72.
- [7] 马斌,徐越倩.民间商会的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以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为个案的研究[J].理论与改革,2006(1):153-157.
- [8] 吴巧瑜,董尚朝.民间商会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透视——深圳“银商之争”的经验观察[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1-25.
- [9] 孙学敏.中国地缘性商会治理与发展研究(上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
- [10] 张冠.嵌入性自组织:商会的组织化机制与路径研究——以J省的地缘性商会为案例[D].长春:吉林大学,2014.
- [11] 刘玉能.多重约束与行动体系:杭州异地商会的实践[D].上海:上海大学,2013.
- [12]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13] 黄志辉.“嵌入”的多重面向——发展主义的危机与回应[J].思想战线,2016(1):96-104.
- [14] HANSMANN H.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5] 孙学敏,苗慧卿.豫商地缘性商会经营智慧——孙学敏教授与35位豫商商会会长、秘书长的对话[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
- [16] 龙永图.中国最小的官也比最大的企业家神气[EB/OL].[2015-03-27].<http://sike.news.cn/article.do?action=articleDetail&id=219045906>.
- [17]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
- [18] 湖北日报.湖北力量:万名鄂商南下广东,十年回流2000亿[EB/OL].[2016-06-18].<http://news.hbtv.com.cn/p/163886.html>.
- [19] 陈东升.2015楚商再出发[J].楚商,2015(2):5.
- [20] 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21] 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13(5):50-66.
- [22] 李鸿忠.第二届楚商大会在汉开幕 李鸿忠致辞[EB/OL].[2015-11-12].<http://news.163.com/15/1112/16/B881LO1100014AEE.html>.

(责任编辑:陈万红)